



# 展望中國教會未來

## 分享大陸修院教學經驗

馬愛德著  
李斌生譯

我自去年九月十七日至十月廿九日，應金魯賢主教之邀，在上海教區天主教修院居住和教學。雖然為期只是六個星期，并非六年或六個月，但我相信這已足以讓我認識至少一處培育未來中國教會領袖的地方。我欲以首位在那裡講授神學課程的外籍教授身份，與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經驗。

在上海市外約十八哩的肥沃農田中，有一座最高的小山，山上矗立一座奉獻給聖母進教之佑的羅馬式大殿。這間大殿是十九世紀末由耶穌會傳教士所建，為向聖母還願的。原來，當地基督徒團體因避過了當日一場暴力的災難而藉此還願。從那時至今，這座教堂已成為恭敬聖母的全國性大殿。在最高的鐘樓上本來站立著一尊聖母像，聖母的姿態是把嬰孩耶穌舉在頭上，但該像在文革期間（一九六五至六八年）被破壞了。原來的聖母像底下部份仍可在上海主教座堂側的花園中見到。

這間修院是全國二十間政府准許的天主教修院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間，它的聖堂和其他建築都群集在山的西麓的斜坡上。修院以這座山的古老名字得名，稱為佘山修院，是一所為六省一市而設的區域性修院，現有一百四十五位修士、六位神父教師及一批非神職教師和工作人員。修院早於一九八二年

開辦，而新的修院建築則在一九八六年完成。建築費用部份由中國政府資助，部份由上海教區承擔。

起初，修院本是為來自華東的學生而設，但由於這裡的培育質素較高，全國各地的主教都派一些修士來到這裡受培育。去年暑期，因不能容納過多學生，以致必須加建一層宿舍。目前，佘山修院的正常課程包括：三年文學、兩年哲學、四年神學和一年晉鐸前的牧民實習，總共是十年培育。為那些較老的學生，培育課程會有伸縮性。老學生中，有些因曾坐監或受過勞改十年、二十年或更長時期，耽擱了他們為晉鐸所需的學術準備，但他們的經歷已是另一種很有價值的準備工夫。

在距離佘山數哩的青浦區泰來橋的本堂範圍內，還加建了一間住舍，為來自上海教區的修士攻讀文學班之用。將來，佘山修院會集中於授予哲學及神學的課程，即只為那些已修讀完文學班的修士而設。

我很榮幸能成為這所修院團體的一份子，用普通話講授四十節我所專長的聖經神修，也教授現代聖經詮釋入門。正因梵二前後的天主教思想及牧民生活剛在中國展開，修士們對此很熱衷學習，也發現到這些東西為中國教會的更新很切合時宜。我們逐段研讀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兩篇聖經靈修、聖依納爵神操中的靈修分辨規則（正如大家可以想像，這些學生需要分辨不少事情），以及最新聖經研究方法入門。

在教授我的科目前，我從一些交談中得知修士們並沒有神學課本。他們閱讀教授們所預備好的講義，很少或甚至沒有閱讀其他參攷書。雖然很多這類優良書籍已在台灣及香港出版，但仍無法到達修士之手。原在北京、今在香港的方濟各會思高聖經學會在十多前年已出版整套中文天主教聖經譯本，十分流行，也在過去幾年刊印了很多介紹聖經的出色書籍。方濟會很慷慨地把大本裝的聖經送給每一位修士，作為禮物，亦給了我一張他們所出版的書籍的目錄。我把這一切連同一百五十本中文彌撒常用經書帶到上海。這六大盒書籍自然引起上海海關的注意。海關官員很有禮貌，但覺得一百五十本彌撒經書未免太多，故此把一百二十本留在海關裡，但數天後，這些書亦安全收回。

為了讓學生熟識這些中文書籍和雜誌，我們安排了一次書籍展覽，并邀請每位修士選擇其中一本書籍或一篇文章，以寫作一份讀書報告。他們可以兩三人一起合作，而有些還被揀選在課堂中發表他們的讀書報告。須知，在我們本國學校所熟識的方法程序，為很多修士卻是頗為新穎的。結果，有幾位修士需要我們的勸誘才願意在小組面前發表他們一生中第一次的讀書報告。由於中國人性格含蓄，害怕犯錯誤失面子，因此要克服困難殊不容易。日子久了，大多數的修士很欣賞這種經驗。結果，達到彼此交流知識的地步；一大堆字體秀麗的讀書報告亦點綴著閱覽室。如果能有少量經濟援助的話，閱覽室的樓上還可安放書架、一架抽濕機和一些

中文神學、聖經、靈修和其他修士用得上的書籍。

過去四年間，因得到了三位熱心人士——我的八三高齡而仍活力十足的父親、已退休仍很活躍的聖名會修女Denis of Mary、及專業圖書館員Una Michaelsen太太的幫助，我才能把三萬冊經過細心挑選的外文神學書運送給佘山修院，作為圖書館基本存書。在一九八八年整個七月份，及再在一九八九年間，三藩市聖依納爵中學圖書館員耶穌會士Daniel Peterson 與我再聯同一些上海的修士、神父和教友，一起進行整理圖書的工作。這些書籍固然為教授們有用，但仍需為修士們提供一些合適的中文書籍。

佘山修院的每日時間表使我們回想起已在很多其他地方消失的培育方式。當中國教會愈來愈認識世界其他地方的培育項目時，一定會作出調整，尤其會安排學生有更多自修時間，也會提供更多機會訓練他們的獨立思考和創作能力。雖然如此，現有的制度確令人欽羨他們的慷慨、熱忱和認真的態度。

每人早上五時半起床，六時開始在聖堂早禱，接著是彌撒。七時在運動場跟隨著錄音帶的指引作體操。早餐後，八時至八時半有短短的自修。大多數學生的上課安排在八時半、九時半及十時半。午飯前在聖堂有簡短的中午經。大多數下午的授課安排在一時、二時及三時。四時至五時是每天唯一的自由時間。學生中有些打籃球或排球；有些自修；有些爬山去參拜聖母大殿；另一些則在山上拜苦路或在聖堂內祈禱。從五至五時半，在聖堂內舉行對聖母的敬禮。晚飯及短時間散心後，從六時半至八時有自修或上課。八時至九時大家齊集聖堂，有靈修閱讀、預備翌日的默想和晚禱。在這樣一天過後，不

久便熄燈安睡。這個嚴謹的時間表在星期六略有變更，下午有一段工作時間，而主日下午亦可以離開修院出外數小時。

雖然很多訪客，包括基督徒或其他人士，上山參拜聖母大殿，及在滿佈竹林的山上作整天的郊遊，但住在山下的修院生活並非旅行休息。修士們住在大宿舍內（指很多人一起住在一間房內），沒有自修的地方。每人只在大自修室內才擁有私人書桌。每日的伙食不會造成身體超重的問題。在中國大陸生活了六星期，我看慣了瘦削的身軀，在與香港的修士相比之下，使我不禁大吃一驚。這使我們不難相信，只需五百元美金便能幫助一位余山修士全學年的費用，亦很難想像能在哪裡可以找到比這裡更佳的投資。

在六位全心獻身修院的教授神父中，三位已超過七十歲，一位超過八十歲。他們管理修院，教學，輔導學生，探病人，週末到上海地區聽告解和舉行彌撒。我很高興能與他們共膳及散心，親眼看到他們對教會的熱愛、為修士的忠誠服務、對未來教會復合的滿懷希望。有些教友老師則負責教授一些副修科目，如語言、歷史及音樂，他們都當過修士，曾準備升神父，惜被迫中斷。他們中不少曾坐監或接受勞改超過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由於教堂繼續重修開放，可以舉行公開禮儀，而在教會產業範圍內及在家中亦愈來愈容許履行牧民服務，因此神父的需求更覺迫切。在約一千位現時尚能公開履行牧民職務的神父中，大多數已超過七十歲，因此，中國教會視培育神父接班人為第一優先任務。我所任教的余山修院可說是全中國最好的修院。今年秋天，有兩位國外神父亦被邀請及被准許在那裡任教。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主任羅國輝神父教授禮儀歷史及禮儀革新入門。他的專長、經驗及練達使他很成功地履行他的任務。慈幼會前任省會長陳日君神父，目前擔當香港聖神修院哲學部主任，是一位很有天份的老師。他講授啟示論及聖三論。這位上海土生的陳神父對於能在大陸教學，實在喜出望外。當我們三位客座教授一起在修院時，曾細心籌備舉行了第一台彌撒。現在，修士們每週舉行兩天中文彌撒，五天拉丁彌撒。亦計劃在一年之內，把中文彌撒推廣到上海教區的堂區中。傳統上，中國天主教徒十分尊敬聖體及各種禮儀，因此我們期望能把這種令人敬佩的特質融合在新禮儀內，造福普世教會。

據我們聽聞，這次嘗試邀請國外教授來余山講學是成功的。將來繼續會有其他中國或外國的教授被邀請前來講學。我們希望他們亦能體驗到一個真實感人的團體的信、望、愛德表，并對這個擁有全球最多人口國家的教會的未來，作出貢獻。我們也希望其他的修士亦能達到他們的需求。我曾訪問過余山以外其他修院，在大多數情況，我同樣深受那裡的師生的真誠及在物質窮困環境下仍能洋溢著喜樂的精神所感動。

在中國教會存在著分裂的情況下，我應該提及為公開修院提供服務的合宜性這問題。的確，有些修士不願加入公開修院，因為他們是政府批准的，受政府監察，而政府並不容許中國教會與作為羅馬天主教會普世牧人和合一標誌的教宗有任何正式接觸。他們選擇「地下方式」的培育或晉鐸，有時對那些在公開修院接受培育及被政府所認可的主教所祝聖的弟兄，予以強烈排斥。亦有些「地下」信友拒絕接受這些公開修院所培育出來的神父的服務。

我與一些朋友都覺得，基於下列理由，幫助公開修院是對的。首先，這些修院事實已在培育著超過六百位修士，他們的培育將繼續維持下去，而畢業的修士將有效地被祝聖為神父，且無數教友將向他們請教，從他們的鐸職中受惠。而且我們應盡可能提供最佳的培育給每位基督徒，使他認識基督信仰的真理。如果外間能幫助提供良好的培育，且事實又被對方請求，則有理由拔刀相助。我個人對公開修院大部份師生的真誠是肯定的。我深信他們大部份人都切願與教宗及普世教會有圓滿的共融，但要達致充份公開表達這份熱願，現時尚超出他們的能力範圍。外間天主教徒能與他們在信愛的合一中共同工作，就等於在某程度上實現我們所渴求的圓滿合一。如果各地天主教徒能與各派別的基督徒（如東正教、聖公會教徒、信義宗或路德會教徒、循道衛理公會教徒等）一起讀書、教學、共用設施、祈禱及工作，則我們亦有理由與那些現時尚未能對教會聖統給予圓滿公開表達的中國天主教徒合作。再者，大家都知道，有些被政府認可的中國主教亦尋到宣達與教宗共融的方法。公開為教宗祈禱現已在多處地方舉行，聖座與中國代表之間的對話正在進行中，因此，我們希望這些利好因素會導致目前的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有些人提出質難，認為任何與這些公開教堂及修院的合作，就等於對昔日和今日為了忠於聖座而受苦的人的拒絕。他們又指出：這些忠貞的天主教徒被人忽視，他們的犧牲不被欣賞，他們被出賣了。

我們固然應該認真地及尊敬地聆聽上述的質問：痛苦的經驗及未治癒的創傷確應受到承認及敬重，尤其應受到國內外那些從未有過同樣犧牲經歷的人的敬佩。但同時，如

果認為在中國教會複雜的情況下只有一種行動途徑是正確的，則這似乎又有點武斷了，因為中國教會各地情況都因人、因地、因時而異。顯而易見，在同一聖神的引導下，有些天主教徒正確地選擇了與政府所支持的教堂、主教、神父及組織不合作態度，而另一些天主教徒亦正確地選擇了某種方式的合作態度。

無論如何，一個團體被另一個團體、或他們同被第三個團體所憎恨排斥，都不是聖神的標記。反之，國內外所有天主教應致力促進彼此間的諒解、同情、寬恕、修好、復合與共融。為了達到治療分裂，我們所有人不要只看我們自己之間的事，而要往外看，顧慮到我們還有很大的任務，要向中國尚未聆聽福音的人宣揚耶穌基督的喜訊。我們固然應透過所有可行的渠道協助中國天主教會內的弟兄姊妹，但並非每一個人都可做每一件事情，特別是在一個像中國那樣受到嚴厲管制的社會中。

在我離開上海前向修士發表的最後講話中，我給他們分享了一個夢想：將來有一天，教宗會訪問中國，并在他所多次提及的佘山聖母大殿，與所有中國主教一起舉行感恩祭。今天的修士當中，亦會有些人分享到那一天令人欣喜及渴望已久的修好盛況。將來，普世教會必將向中國教會的經驗及思想學習，正如它目前向拉丁美洲的經驗和思想學習一樣。那時，曾多個世紀受過迫害的中國教會將享有更大的自由。當天主聖言公開地以中文由中國人口中宣佈給自己的中國人時，教會的身體便會以無可想像的方式長大。

在離別佘山前，修院團體中兩位成員靜靜地告訴我，我的夢想也是他們的夢想。我猜想這還會是更多人的夢想。